

表率篇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先进代表事迹选编

中共 中 央
直属机关委员会宣传部编

红旗出版社

表 率 篇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先进代表事迹选编

红旗出版社

表 率 篇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先进代表事迹选编

*

红旗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75 印张 575 千字

1986 年 10 月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1,000 册

书号 3160·074 定价 0.35 元

编者的话

近几年来，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在完成中央交给的各项任务——为改革和四化服务的各项工作，涌现出一大批先进模范人物。他们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忘我地探索、开拓、奋斗，以自己的模范行动谱写出一曲曲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正气歌，为党增添了光彩。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六十五周年之际，中直机关党委先后召开表彰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先进支部和优秀党员大会，同时，举行了中直机关先进代表事迹汇报会。对先进模范人物和他们的先进思想、事迹进行了表彰和宣传。这里选编的六位先进代表的事迹，曾在中直机关广大党员、群众中引起很大反响，是我们进行党性、理想和纪律教育的好教材。

愿先进人物的进取精神和奉献精神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财富，愿学习先进、争做表率成为我们大家的自觉行动。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宣传部

一九八六年七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委员会宣传部
虽然离休了 还是“三大员”	
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电影制片厂	赵子岳(1)
到社会大课堂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直机关先进工作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张一(12)
在基层工作锻炼的日子里	
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赵惠令(24)
任何时候不忘党的根本宗旨	
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中共中央党校	陈方华(35)
牢记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	
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廖魁(49)
搞好电视军事宣传 要有拼搏精神	
中直机关先进集体代表、二等功荣立者	
中央电视台军事部	叶国平(59)

虽然离休了 还是“三大员”

中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
北京电影制片厂 赵子岳

我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离休干部，今年七十七岁。我没有什么英雄模范事迹，只是做了一些我应该做的工作，生活中注意正确对待并解决碰到的一些新问题。

一、我还有一点余热，应该怎么用？

刚离休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不自然。原因有两个：一是五十年有组织、有领导的生活过惯了，有事请示领导，做对了，大家称赞，做错了，大家批评，一举一动都有个依靠。离休后，老干部科对我们照顾多，严格要求少，自己感到没依靠。二是长期工作的人，突然没有事干了，就象没了着落，精神上感到空虚。有人说：“你养老嘛！钓鱼、养养花、逛逛公园，不是挺好吗？”但我觉得身体还很好，还有点余热，这点余热烧得我在家坐也坐不住。于是，我就自己管自己，给自己规定任务。我想：我虽然离休了，还是三大员：

第一是共产党员。职务可以退居二线，党员永远应该在第一线。社会在前进，党的政策在发展，如果思想上不抓紧，就会象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要不断提高思想认识，在政治上和党的政策保持一致，决不能让自己的思想也离休。

第二是人民勤务员。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虽

然离休了，还要尽可能做有益于人民的事情。为了保持晚节，不利于人民的事，坚决不干。

第三是电影演员。电影演员这个职业与别的职业有所不同，离休了，还能干，不影响青年演员的成长。你演你的青年人，我演我的老头子，谁也替不了谁。但是我要做党员的电影演员，也就是党所要求的电影演员。电影演员是出头露面的人，千千万万人都认识他，眼睛都看着他，做错一件事，说错一句话，都会影响很多人。所以还要明确自己是一个电影演员的党员。

为了保证我的任务能够顺利完成，我又给自己规定了每日三套功：

1. 健身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有好的身体才能为人民做更多的事。我每天早上起床后，做三、四十下俯卧撑。我从四十多岁做到现在，刚开始是因为我是演劳动人民的人，得有劳动人民的气质，胳膊要有肌肉，肚皮不要胀大。要是不锻炼，象个地主，就演不了劳动人民了。炼到六十岁后，我感到锻炼还对长寿很有利。我没有吃什么营养品，鱼、鸡都不大吃，可七十七了，还能到处跑着演戏，就是靠早上这点锻炼。我每天早上锻炼半小时，把全身关节都活动开，天天如此。

2. 思想功。这是内功，每天把自己的思想审查一遍，净化自己的灵魂。灵魂每天都得洗涮洗涮，不勤洗涮，容易出毛病。

3. 创作功。我的职业是电影演员，至今还在演戏，每天要看剧本、观察生活，理解人物。

这就是我的三大员和每日三套功。

一九八四年，我一共拍了五部电视剧，一九八五年拍了五部电视剧，一部电影，今年估计还下不了五、六部。在祖国的土地上走南跑北，心情很舒畅，做出一点小小的成绩，精神上也得到了安慰。

二、花人民的钱要觉得心疼。

我是过惯了低水平生活的人，小时候生长在山沟里，参加革命后，长期在太行山上，进城以后发工资还不习惯。口袋里装几个钱，也到商场里逛一逛吧。进去以后，五花八门，看看哪样我也不需要，一问价钱还挺贵。算了吧，什么也甭买，钱原封不动又装回来了。吃饭也简单，山西人，就好吃面，吃一碗炸酱面就挺香的，再高的生活觉得没必要。我前一个老伴，是和我一起抗日过来的，她当会计，善理财。我领回工资交给老伴。她也不好花钱，都存进银行。人都说我们老俩口抠，说这是山西人的特点。其实山西人也不都抠，大概就是我们老俩口抠得厉害点。我说抠也没什么不好，我抠也不是光抠自己，我对公家的东西也抠。举个小例子：公用的信纸信封，个人写信我从来没用过，公用的东西干嘛用来写自己的信，那不合适。后来，我老伴在人事科工作，别人裁下来的小纸条扔到废纸篓里，她捡起来，钉成一个个小本子，大家都爱用。家里没事时我就把灯关上，耗费电干什么？我不是光抠自己，看到浪费，特别是浪费国家的钱，人民的钱，我真一肚子意见，看不惯。

一九八三年，我们厂里拍《生财有道》，我扮演仁老乐。我那年七十四，这个戏里还有些困难的镜头，要下河，还要开拖拉机。我哪会开拖拉机呀？还得现学。厂里觉得，这么大年纪，到外景地去拍戏，万一出个漏子怎么办？戏拍了一

半也浪费了。厂里就决定让我老伴一起去，在生活上照顾我。我觉得这样也好，因为我这么个老头子，到外景地，对人家是个包袱。别人都要为我担心，只怕一下出了毛病。要是老伴跟上，大家也就省心了，所以这是个好事。可是，有一天我发现摄制组的名单上有我老伴的名字，把她作为工作人员，她的开销也由公家报销。这个事，我感到不合适。我感谢厂领导对我的关心，但我不能这样做。哪有出差带家属，又让人民花钱的道理呢？我和老伴商量，她的路费、伙食费全部自费，不让厂里报销。制片主任坚持厂里决定，我同他争了好几回，最后，总算依了我。近几年来，我在厂里拍了三部戏，有《骆驼祥子》、《生财有道》和《迷人的乐队》，都是这样坚持的。有人说“你这不是贴钱演戏吗？”我说，人民的钱，不应该花的，花了，心里也不安，在艺术上能做出点成绩，就是倒贴几个钱也痛快！

三、不能先讲酬劳，应当先作贡献。

共产党员应无条件地服从革命利益，我们的革命先辈从来不是为赚钱才革命的。如今情况不一样了，但也不能把贡献和酬劳颠倒过来，什么事都先讲钱。我常想，我对人民到底做了多少贡献？我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电影演员，演一部戏要好几十人，大家一齐动手，你一个人也搞不成，你不过是这几十个人中的一个成员，你能做出多大贡献？可是人民为我付出了多大代价？这简直算不清。从我参加革命那天起，人民就养活我，一直到现在，看病吃药住院，人民都包下了。我的工资不低，离休了还多发两个月工资，还要怎么样？说句不好听的，最后到八宝山，人民都包下了，火化都是人民花钱，这个账没法算。我觉得我做的工作确实是有限

的，而欠人民的就太多了。

有一次，剧团评级评薪，大家提到我的名字。我说，要评定某个人的待遇，首先要考虑他的贡献。我觉得我的待遇已超过贡献，不要再给我提级了，把这钱给年轻同志提薪吧，他们有的待遇比贡献低，生活上困难很多。就这样我坚决不同意给我提级。

一九八四年，山西电视台约我去拍了一部电视剧。拍完后，人家给我一打子钱。我想我不能要这钱，因为厂里已同人家订了合同，收取劳务费是工资的三、四倍。人家已经给厂里那么多钱了，自己还要人家的酬劳，那象话吗？我坚决没要。紧接着，山西临汾地区也要我去拍一部电视剧。临汾是我的家乡，我说，要是给我酬劳我可不去，给家乡拍戏更不能要酬劳。拍戏期间，收到家里来信，说山西电视台给我汇来三百块钱。我想，一定是那笔酬劳又给寄来了，这怎么办呢？再退回去，这不好。正好，临汾城要修复鼓楼，大家正在捐款，我想这好极了，就把这三百块钱捐出去修鼓楼了。

一九八五年，厂里又给我提出一个问题，让我参加拍《迷人的乐队》。可是，我已经答应参加雁北地区拍的一部电视剧，太原电视台拍《新星》，也要我演一个角色。正要动身，厂里让拍《迷人的乐队》，这个事使我为难了。要论先后，应该到山西去，可《迷人的乐队》是我们厂的戏，我是厂里的人，不能把厂里的戏撂下不演，到外头演戏。我刚来北影时，不懂得怎样拍电影，在厂里学到现在，是这个厂培养了我，我对她是有感情的。怎么能把厂里的任务丢下到外面去演戏？如果人家多给我酬劳，我不也成了向外看，向钱看

吗？想来想去，我给约我的两个单位写了信。信上说，你们约我在先，我们厂要我演戏在后，要论先后，我应当先到你们那里去。但是，我不能丢掉本厂的任务，到外头去工作。那样影响不好，请你们原谅。

一九八五年，我离休了。我外出演戏，厂里就不再和人家订合同、收取劳务费了。而且有的摄制组是承包的，你要是不要钱，并没省给国家，而是省到人家个人手里了。我想，既然不能省给国家，那我就收了吧。开始接受几十块，后来收过几百块，到后来发展到千二八百块，我心里就不安了。心里说，共产党员要这么发财还得了吧？这事怎么办呢？我就跟老干部科讲，人家给我这么多钱，怎么处理？他们说这叫多劳多得，你就收着吧。我又问个人所得税到哪里去交，他们也不清楚。到现在交税的门还没找到，这个事我还得想法解决。

四、家庭能先进，革命有保证。

我的前一个老伴是和我一块抗日过来的，是共产党员。“文化大革命”中，我被打成黑帮，在厂里挨整，老伴也被弄成黑帮，在家里挨整。没几天，老伴就被折腾死了。儿子、儿媳因单位让划清界限也不敢沾我的边，我孤独地生活了四年。后来，我的问题解决了，重新工作后，我觉得自己还要好好生活下去。要好好生活，没有老伴不行，一个人生活，到老得不能动时怎么办呢？找老伴，我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身体健康；第二生活习惯要适合我这个“老抠”的习惯。我花钱放不开手，弄个大手大脚花钱的人，就生活不到一起；第三要忠厚老实。

经过剧团的同志帮助，真找到这么一位。她是师范大学

一位教授家的保姆。我觉得她人品很不错，就请她到我家里来了。她来之前，我和儿子把前一个老伴的东西收拾了一下，不留下什么痕迹，以免让人家看了不舒服。她来了没几天，前老伴的侄子来了，要到八宝山看他姑姑的骨灰盒。这事实在不妙，怎么办呢？没想到，我这个老伴租了一辆车，拉上我和头一个老伴的侄子，她和我们一起去到了八宝山看前一个老伴的骨灰盒。我这个老伴没文化，她来我这里后，一直在街道工作。后来还当了妇女主任、校外辅导员，后来街道上每月还给她二十块钱工资。我看她在街道工作热情很高，心想，她为街道工作，我能自私吗，我能让她不干街道工作，光照顾我？我不能这样，还得帮助她、支持她。她给街道上的孩子们做工艺品，不会画画，我学过几天美术，就帮她画。有一天，我们俩聊天，我问她，你怎么还能和我们一起到八宝山看前一个老伴？她说，怎么不能？她不也是共产党、八路军？没有共产党、八路军我能翻身？我从小受苦，跟着我妈妈讨过饭，是共产党、八路军救了我们。她是共产党、八路军，我对她能有什么成见？我只该感谢她。我又问她，为什么一天老在街道上忙，连家都顾不上？她说，我翻了身，能光顾自己享福吗？我也应该为社会做点事。我没什么本事，就在街道上能做什么就做点什么。后来，她把自己每月二十块钱的工资攒到一块，拿出两百块钱，买了照相机捐给活动站，供孩子们学照相。我觉得她这些事都做得很不错。

我的儿子、儿媳工作很忙，带两个小孩很累，在这种情况下，老伴干脆把两个孩子也包揽过来了。一天看孩子、又干街道工作。我问她这样行吗？她说，为什么不行？别说他们还是咱们的儿女，就是别的解放军有了这样的困难，我也

应该帮助啊。这样一来，出现了一个新问题，教育孩子的责任落到我头上了。我过去只希望自己有一个身体都健康的家庭，这时，看到“文化大革命”遗留下来的种种不良社会现象，我感到，一个家庭，不光要身体都健康，还要思想都健康。我家里，儿子、儿媳都是共产党员，老伴虽不是党员，思想也进步，就看孙子、孙女长大了是什么样子。我对他们管得很严，吃饭，要他们懂得让人，掉了一粒米也要捡起来吃掉。自己能做的事就不许让别人做，衣服洗不了，手绢、袜子可以洗吧，这些也让别人洗，那就不行。玩的时候不能损坏任何东西。不能伤害别人，要帮助别人。甚至早上起来，被子叠得不整齐都不行。这又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严格教育孩子，他们同爸爸妈妈一两个星期才见上一次，觉得新鲜，亲热得不得了。又是吃的又是穿的，慢慢地孩子们就觉得爷爷奶奶成了爸爸妈妈，爸爸妈妈倒成了爷爷奶奶。我想，这样不行，我还得当我的爷爷奶奶，你们当爸爸妈妈的有教育孩子的责任。要不然，我们将来走了，你们还是这样和孩子吃吃喝喝，那还行吗？这时，两个孩子也长大了，孙女上了大学，孙子也上了初中。虽然他们父母确实还有困难，但我非要交给他们不可，坚决不管了。经过一年时间，他们也慢慢懂得应该怎么教育孩子了，我觉得，孩子好了，他们也好。现在我们全家思想都一致，两个孩子都是三好学生，共青团员，女孩子在争取入党。我家先后被街道、区、市和全国妇联评为五好家庭。

还有一件事，我想把前一个老伴存下的钱拿出一万元捐给剧团，征求全家意见，老伴的态度出乎我意料之外。当时一共有一万六、七千块钱，我打算给老伴留下六、七千。她

不是国家职工，没工资，我去世后，她怎么生活？我得给她留下点钱养老。没想到，老伴坚决不要，非得把这笔钱都捐给剧团不可。她说，你要是不都捐了，我也得送到剧团去。后来，我瞒着她只捐了一万元，但对她说全捐了。过了几个月，我因病住院了，在医院里我才告诉她，我给你留了六、七千块钱防老。因为事情已经过去了，老伴没办法，也就默认了。向剧团捐钱时，我也问过儿子、儿媳，他们说，这是你老人家的血汗，你为国家办好事，这太好了，我们只有支持，没有别的说的。

可以说，我的家庭思想一致，团结和睦。我觉得一个共产党员上班干革命，下班回家也要按照革命的要求处理事情。

后来我们搬到厂里住了，老伴的街道工作不能做了，我也七十多岁了，两个孩子也交给他们的父母了，老伴这时才开始对我有所照顾。很多同志说，在咱们国家，象你这么大年纪还上银幕的人，找不出几个。我觉得，我都七十七了，还能上银幕，老伴对我的帮助是不小的。老伴说：你象个老小孩，我要不管你，你自己在生活上什么也干不了。我说，是啊，要让我选幕后冠军，我一定投你一票。

五、希望祖国的电影事业越来越年轻。

我常想，革命不是几个人能办的事，我自己要进步，也希望别人比我更先进。因为，革命需要大量的人才，如果你不服我，我也不服你，那就不是从革命的整体利益出发。革命也不是一两代人所能完成的，需要世世代代干下去，一直干到共产主义。就象接力赛跑一样，怎么交的棒，要回头看看，不能离休了就算完事了。

近来，找我拍戏的多半是中、青年导演，有时我疲劳

了，想休息休息。他们说，你从扶植青年导演出发，和我们合作一次吧？这话一说，我心就软了，就答应他们了。每次拍戏前，我总要跟他们说，你再年轻，也是导演，我再老，也是演员，演员就应当服从导演的指挥，请你大胆安排吧，不要有什么顾虑。这样，我们就合作得很好。我愿意看到我们电影事业的未来。从年轻导演、年轻演员的身上，可以看到电影事业的将来。我虽然老了，但我希望祖国的电影事业越来越年轻。

影协和《大众电影》评百花奖，对电影演员表演艺术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促进。但是现在评选演员的根据，只能是银幕上的表演。而社会主义的演员，不仅要有表演才华，在日常生活中，也应有一定的政治素养。因为文艺工作者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你自己的心灵不美，怎么去影响别人？正因为演员在政治思想、道德品质、生活作风上有较好的素质，他在银幕上的表演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所以，一九八一年，我把一万元存款捐给了剧团，设立了北影演员剧团“青年演员进步奖”。当时议定四十五岁以下的为青年演员，每年团庆日发奖，过去发钱，去年改发奖杯。观众曾经有这样一句讽刺电影演员的话，“银幕上是一朵花，银幕下是豆腐渣”，这种名声不大好听。我想，我们应该做到银幕上下都是“一朵花”。

六、当陪衬红花的绿叶，很值得。

一件事情能得出比较正确的结果，往往是有曲折的过程的，因为原来的认识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程度。比如，有人说我是一个甘当绿叶的老黄牛演员，我说，是的，我现在是这样，但不是生来就是这样。原来我也有出名的思想，也

想演个主角，是经过曲折的过程才认识到的：

1. 共产党员不应当有个人出风头的思想。

2. 演员对自己应当有自知之明。演员自己不了解自己是个什么材料，去扮演另外一个人，那怎么能行呢？演戏和打仗一样，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知己，就是知道自己，知彼，就是知道要演的那个人物，这样才能把他扮演好。演员要有自知之明，自己能演什么，自己要清楚。

3. 不能轻视配角，配角演好了，也不是很容易的。

从此我就明确了，自己是为革命来当演员，不是为演主角才当演员，革命需要我演主角，当然我也要演，需要我演配角，只要对人民有益，就是两三个镜头我也要演好。我能为革命这朵红花，当一辈子陪衬的绿叶是值得的。

最后，谈一点体会：我觉得，人的思想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而变化，有时变好，有时变坏。比如老年人，有的变得消极了，有的就不服老。我要切记住一句话：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不断地改造主观世界。要活到老，改造到老！改造的方法只有一条，还是那句老话：批评和自我批评。依靠集体开会固然是很好的，但更重要的是自觉性。不自觉的话，开会也能滑过去，作个假检讨也能让人满意。能不能自觉，有一个最大的考验，就是敢不敢把自己的思想交给集体。如果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群众对自己的看法完全两样，别人对你有看法只字不对你说，你自己觉得自己还不错，这样生活下去是很可怕的。我觉得，要做一个真实的人，不做虚假的人；要做光明磊落的人，不做神秘的人。除了工作上的保密之外，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事。我要做一个透明的人，我正在向这个方向努力。

到社会大课堂去宣传马克思主义

中直机关先进工作者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 张一

我是在团中央系统搞理论教育工作的。现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负责专业基础理论部和经济管理学教研室的工作。我的工作没什么值得说的。现在，只是为了接受大家的监督，来汇报工作。

汇报的第一点是工作简况。

我除了做好校内本职工作外，还做了一些社会工作，今天侧重汇报的是社会工作。从一九七九年至今，在北京市和其他一些省市及深圳特区的工厂、机关、部队、学校、农村，给青年以及干部、群众讲演了六百多场。讲演的主要内容是引导青年树立共产主义理想，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宣传讲解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形势，以及改革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着力于用理论分析回答青年及干部、群众在认识上的疑难问题。为了扩大宣传效果，还写了《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分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改革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比资本主义强》等六本通俗政治理论读物（后一本正在印刷）。其中《社会主义优越性问题分析》发行了五十万册。《改革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行了近百万册。

汇报的第二点是我为什么要到社会上去宣传。